

笈笕书院文库

杨玲 著

宋代出版文化

雕版之业，始于唐而盛于两宋，宋版书刻尤为精品，为世人所重，被誉为拱璧珠琳。其刊工之巧，内容之精，致以千年之后犹感墨香依旧。由是，后世爱书『佞宋』成癖者众多，这些『佞宋』成癖者，往往又都是一时代学界翘楚。这一方面是宋代出版业极盛对后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凝结于宋版书上时代文化精神作用的结果。故，我们可以宋代出版业为切入点，以窥两宋社会文化及时代风貌之一斑。



文物出版社

宋代出版文化

杨 玲◎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李 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出版文化 / 杨玲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5

(笈笕书院文库)

ISBN 978 - 7 - 5010 - 3442 - 0

I. ①宋… II. ①杨… III. ①出版事业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①G239. 29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3516 号

宋 代 出 版 文 化

杨玲 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80 × 1230 1/32 印张: 12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442 - 0 定价: 40.00 元

笕竺书院文库 编委会

学术指导

饶宗颐（笕竺书院名誉院长）

编委

（以姓名拼音为序）

陈 来	陈鼓应	陈支平
冯达文	葛剑雄	葛兆光
郭齐勇	赖永海	林庆彰
刘笑敢	孙家洲	汪荣祖
汪毅夫	王学典	王子今
吴振武	徐 泓	詹石窗

主 编

王 维 生

编 务

柯 虹 陈路加 戴美玲

总 序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寢则堪久，通则不乏。
——《文心雕龙·通变》

篋笥是竹子的雅称，书院是君子之所寓。

2009年初夏，厦门篋笥书院落成，鹭岛遂有一处可资商量旧学，培养新知，赓续书院文化之地。书院在筹办之初，审当下之时、明过往之势，确立“旧学商量，新知培养”的宗旨，期冀新生的书院既能承继传统，又能创新发展。在时代转型之际，构拟书院框架，无立异之心，有求真之意，运作三年多来，筚路褴褛而有条不紊。出版《篋笥书院文库》即计划中的事项，也是书院应有的题中之义。“数必酌于新声”，渠成而水到，巢筑而凤来。《篋笥书院文库》第一辑应运而生，呱呱坠地，甚可喜也。

八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编撰了《万有文库》。嗣后，各门类文库相继出现，成就斐然。“保存为名，启智为实，”是不少文库的理念，金匱石室也好，藏之名山也好，从四库到四部，到万有文库，中国文化的流播，渊源有自，一脉相承。

如何在众多的文库中确立一席之地，是我们编辑《篋笥书院文库》，取择文本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勿为媚俗之工”，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通变》中写道：“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可变革者，遣词捶字，宅句安章，随手之变，人各不同；不可变革者，



规矩法律是也。虽历千载，而粲然如新，由之则成文，不由之而师心自用……”

今后，但凡其业维新，文有经术，学能益世，通变堪久之文，均会被纳入笱筍书院文库的视野。“漱六艺之芳润，储二酉之情采”，笱筍书院将倾心关注当今学界学术动态，择取海内外学者的佳构杰作，陆续编辑出版。

此外，书院开办之初，亦创立了每年一届的“海峡两岸国学论坛”。每年深秋，两岸三地，名儒耆硕、学者俊彦，齐聚笱筍，纵论古今、谈经论道、论议宏富，足以嘉惠学林，值辑成集，此亦为文库编辑所资之源。

今日，《笱筍书院文库》从无到有，可以想见，假以时日，必能蔚为大观！

厦门笱筍书院理事长 王维生
2012年5月



序

王子今

“宋版”成为代表名贵珍稀藏书的符号，不知自何时起。清乾隆帝诗《题宋版韩昌黎文集》所谓“唐家制度传垂露，宋氏槧铅存壁窠”（《御制诗集》四集卷二九），汪琬诗《自诉四首》之二所谓“樽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笈装宋版书”（《尧峰文钞》卷四六），都反映了“宋版书”作为珍贵文化遗存为人们所宝爱的事实。施闰章诗《赠同年季沧苇侍御》写道：“藏书癖宋版，列架与山垆。”（《学余堂诗集》卷一〇）前句说明了收藏界的一种文化倾向，后句则告知我们，清代民间的宋版书尚有可观的数量，藏书家获取大概并不十分困难。时至今天，当然因为又经历了多次入侵和暴动等摧残文化的急烈的社会动荡，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

宋代出版事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有宝贵印记，当然并不是因为“癖宋版”的收藏家的喜好，而首先在于这些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我们注意到，乾隆《御制诗集》四集中，收有以“题宋版某书”为标题的诗作多至19首。如卷二五《题宋版六经图八韵》、《题宋版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六《题宋版范祖禹帝学》、《题宋版朱子资治通鉴纲目》、《题宋版前汉书》、《题宋版春秋分记》，卷二七《题宋版通鉴纪事本末》、《再题宋版九家注杜诗》、《题宋版楚辞》，卷二九《题宋版韩昌黎文集》，卷九三《题宋版周髀算经》、《题宋版周易程传》，卷九四《题五经萃室岳珂宋版五经》、



《题宋版陆宣公奏议》、《题宋版朱文公校昌黎集》，卷九五《题宋版郭忠恕佩觿》、《题宋版聂崇义三礼图》，卷九六《题宋版千家注杜工部诗史》，卷九七《题宋版尚书详解》等。从作品内容看，这位皇帝写这些诗歌，并不是在炫耀皇家藏书“列架与山埒”的富有，而是表述了真正用心体味“宋版书”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品质的心得。其中《题宋版郭忠恕佩觿》有“名寓佩觿解结求”句，又说：“小学从来大学本，今文应溯古文由。”看来作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宋版书”来增益知识，解决疑难的。

有学者指出，“汉学与宋学皆为传统学术的重要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历程中，出现过“宋学、汉学相与争鸣以及汉学与宋学相调和的局面”，也出现过“汉学与宋学会通”的形势。（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下册第680页）有意思的是，就文化传播形式而言，汉代和宋代都分别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文明成就。这就是汉代纸的发明和逐步普及以及宋代以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为标志的印刷技术的进步。宋代出版业的兴盛，自然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密切关系。但是要以全景的眼光说明其实现的条件，应当注意到文化的全面进步。

就我稍微熟悉一些的汉代文化生活而言，图书收藏和流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的迹象引人注目。《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歿，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献的数量。死后随葬图书的情形，在汉代墓葬中已经多有发现。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五行》、《九主》、《经法》、《五星占》、《刑德》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



繆子》、《晏子》、《六韬》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四十号汉墓出土《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苍颉篇》、《万物》等，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简《仪礼》等，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算数书》、《盖庐》、《引书》、《脉书》等，都是墓主生前极其爱重甚至死后仍不愿舍弃的图书珍藏。《后汉书·列女传·陈留董祀妻》说，曹操曾经询问蔡邕之女蔡文姬：“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答道：“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蔡邕“赐书四千多卷”，应是当时私人藏书数量较多的一例。

西汉学者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的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诗人们或以“槐市”与“杏坛”为对，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



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有不同的情形。卖书的人有时候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写道：“（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引《文士传》说，“（刘梁）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梁贫，恒卖书以供衣食。”学者因为贫困不得不“卖书于市”，以求取最基本的“衣食”的资费，是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鬻书易粟”这种精神生活消费与物质生活消费的强烈对比，透露出了某种文化史的悲哀。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书”可以交易于“市”并且大约可以较快销出的历史事实。

尽管汉代的图书收藏和图书市场已经远远超越前代，却又不能和宋代文献流通的形式相比。现在尚不能确知王充和荀悦在“市肆”读到的书籍是否有用纸书写的。《晋书·文苑列传·左思》说，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发生在西晋时期的事，然而为书籍流通创造良好条件的纸，却是汉代的伟大发明。汉代出现早期纸本书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宋代出版是公认的体现文化史和学术史上一个丰收季节的标志。然而以此为专题的专门的学术论著却并不多见。特别是从文化史视角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应当承



认已有成果的**内涵**尤为薄弱。杨玲博士的学术专著《宋代出版文化》，可以使我们的有关认识得以充实。

杨著《宋代出版文化》分论宋代出版的时代背景、宋代出版文化概况、宋代出版介质的变迁、宋代出版中诸阶层文化生态、宋代出版物流布与文化影响等问题，可以说多方位地总结了宋代出版的时代文化条件、社会文化生态及其文化品质和文化作用。其中的创见和新知，读者可以从容品味。私意以为给我个人较多启示的，是关于出版流程、出版管理以及出版介质与出版传播方式等问题的论说。近读有学者考察宋代出版管制的论文，其中指出，“宋代出版业兴盛，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出版管制措施，主要表现在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与出版管制的方式两个方面。其一，被管制书籍的类型主要有：禁止刻印、销售议论时政、军事边机的书籍；禁止刻印、销售宗教异端等书籍；禁止刻印、销售违背儒家经义的书籍；在派别斗争中禁止刻印、流传反对派的书籍；国家垄断《历日》的印刷权。其二，出版管制的方式是：采取书稿审查制度；普遍实行违禁图书告赏法；对违禁雕印、销售、传播图书者予以惩罚”。（方宝璋、高月梅：《论宋代的出版管制》，《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3期）相关问题，杨著《宋代出版文化》第二章“宋代出版文化概况”中的“宋代出版管理”亦曾有所讨论。

例如，《宋代出版文化》一书指出，宋代政府禁止出版的图书主要有以下六种：1. 天文图谶；2. 明教绘画；3. 边机时务，邦国机密；4. 法令、历书；5. 会要、实录；6. 党争文字。《宋代出版文化》还写道，“宋代出版管理制度包括事先审阅、事后查检、奖励检举等”。对违法雕版印卖者的法律惩处，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对非法出版物采取‘毁版’、‘毁劈’、‘焚之’、‘缴纳焚讫’等措施，从印版抓起，防止死灰复燃，再度翻印。其二，在宋代，县是基层司法机构，其



刑事裁决权限于杖刑，州一级受理县一级呈报的徒以上刑事案件。科罪施刑主要有杖刑、徒刑、流放等，如‘根捉’、‘行遣’、‘责罚’、‘杖一百’、‘拘收’、‘送狱’、‘流三千里’等。其三，从宋初到宋末，制裁渐趋严厉。由宋初一般的‘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发展到‘徒二年’；从‘行遣’发展到‘流三千里’；并且增加了杖刑。从一般的‘追取印版缴纳’、‘缴纳焚讫’，发展到‘合行毁版’，‘当官弃毁’、‘当官焚毁’、‘当官劈毁’、‘日下并行毁劈’，严行规定在官员监视下当众毁版，以杜绝任何隐匿流布的可能。这些都反映了雕印传播影响的扩大和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统治者对雕印传播控制愈来愈严。其四，宋代出版法令所制裁的对象不只局限于非法雕版者，‘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且刑狱司还根究印撰之人，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印书者、售卖者、撰写者同样立禁查处，严厉制裁”。论者还指出，“随着宋代书业出版的繁荣，皇帝的敕令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图书刻印传播而言，诏敕的地位显然优于相对稳定的刑法，这是因为诏敕往往是从特定的社会状况出发的，有关书籍刻印的法律都是依据当时社会矛盾及出版状况而颁发的，不似刑法那样属长期固定的法规，故处理事件更及时、更有效，更能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皇帝的敕令”“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诏敕的地位显然优于相对稳定的刑法”，体现最高执政者的个人意志可以超越法律的情形。

集权政府对出版的控制，有“制裁渐趋严厉”，“控制愈来愈严”的趋势。以较长时段为对象的历史考察，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认识。当然，这只是我们阅读《宋代出版文化》一书获得的知识之一。全书提示我们应予认识和理解的文化史信息，其实是相当丰富，相当生动的。

明代学者徐渤《徐氏笔精》卷六《文字》有“帝王好书”条，列举了历代君主求书爱书的故事：“历代



帝王皆好典籍。秦火为万古罪人，无论已。汉兴，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景帝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刘向等校定。光武入洛，书二千余辆。后于东观广集新书，命班固等雠校。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订群籍。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刻石。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隋文帝遣使四方，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炀帝观文殿构甲乙丙丁书屋。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缮写，藏内库。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以千钱购书一卷。后唐庄宗募民献书，及三百卷者，授以官衔。明宗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宋太宗下诏购募亡书，分置书府，涉弼等并赐科名。太宗构崇文院以藏书籍，分经史子集四库。仁宗诏中外士庶上馆阁阙书，每一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徽宗诏郡县访求秘书，助教张颐进二百二十余卷，赐进士出身，李东一百六十卷，补迪功郎。高宗南渡，献书有赏。元世祖遣使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我太祖定鼎之后，极重儒臣，诏纂国家切要之书。成祖诏修永乐大典，一时儒臣毕集，天下贤才聘辟无算。凡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各取一部送京。……”所谓“帝王好书”，其实涉及不同的文化层次：一种是喜好收集图书，即所谓“求”“购”“藏”“贮”事；另一种则重视图书的整理出版传播，包括“雠校”“考订”以至“雕印卖之”等。如果汉代“正定五经刻石”也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出版”，由此至于宋代及以后出版业的大兴盛，中国出版史于文化传播方面的意义，实在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杨玲博士著《宋代出版文化》做了很好的工作，值得学界肯定。我们也希望今后有以图书出版和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更多的学术论著面世，增益并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化史进程的认识和理解。



目 录

总序/王维生/1

序/王子今/1

绪论/1

- 一、研究缘起与方法/1
- 二、研究综述/8
- 三、宋代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13

第一章 宋代出版的时代背景/34

第一节 宋代出版的物质基础与技术要素/34

- 一、生产力的发展/34
- 二、宋代出版的工艺技术要素/39

第二节 国家文化政策的倾斜/44

- 一、礼士崇文/45
- 二、完善科举/46
- 三、重视图书藏刻/48

第三节 宋代出版的内在动因与助力/50

- 一、学术发展与社会风尚/50
- 二、宋代出版的内在动因/52
- 三、宋代出版的助力/53

第二章 宋代出版文化概况/58

第一节 宋代图书出版系统/58



一、官方刻书出版/60

二、私人刻书出版/84

三、民间刻书出版/103

第二节 宋代的报纸出版/105

一、“进奏院状报”/108

二、民间小报/116

三、邸报/120

第三节 宋代出版的特点/132

一、宋代出版业的特点/132

二、宋代出版物的特点/138

第四节 宋代出版流程及其规律/142

一、编辑/142

二、校勘/152

三、流通/165

第五节 宋代出版管理/176

一、禁书之举/176

二、保护版权/181

三、管理制度/184

四、控制手段/187

第三章 宋代出版介质的变迁/194

第一节 宋代出版介质及其意蕴/194

一、出版介质与出版传播方式/194

二、纸质出版介质/200

第二节 技术进化与宋代出版传播/205

一、技术进化中的宋代出版传播/205

二、出版传播与活字印刷/208

第三节 出版介质变化的文化触角/215

一、宋词创作和传播/215

二、版本学研究/219



三、汉字/225

第四章 宋代出版中诸阶层文化生态/235

第一节 士人/237

一、士人阶层结构与其人格特质/238

二、士人经商缘由/243

三、士人鬻书/245

四、官商私营的出版业/248

第二节 书商/250

一、书商活动场所/250

二、书商行业组织/254

三、书商特点/255

四、书商文化功能/260

第三节 刻工/264

一、刻工题名及其款式/264

二、刻工工价与社会地位/267

三、由刻工之见版本研究/273

第五章 宋代出版物流布与文化影响/277

第一节 汉字文化圈中的宋代出版/277

一、“文化圈”相关理论/277

二、汉字文化圈/279

三、宋代出版与汉字文化圈/282

第二节 宋代出版物流布的条件/287

一、宋代的海外贸易/287

二、宋学的传播/294

第三节 宋代出版物流布的海外影响/297

一、北传高丽/298

二、东渡日本/309

三、南下越南/325



余论/331

一、宋人刻书出版的文化透视/331

二、后世的佞宋之风/335

三、宋代出版与文化权利的扩张/338

附录/345

参考文献/349

跋：信可慰生平/孔 睿/363

后记/365

